

學術對談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對談人：李金銓、黃煜、陳韜文

統稿：黃煜、陳韜文

整理：趙心硯



李金銓教授
(Prof. Chin-Chuan Lee)

「我喜歡以小見大，猶如牛頓從一個蘋果看到地心引力。我研究的問題多屬這類。這樣一方面照顧到因果規律，另一方面也沒有把豐富的意義簡單化。我覺得研究最好能夠抽絲剝繭，執簡馭繁，用簡單的語言表述豐富的意義，有如剝筍見心。但人類社會畢竟充滿複雜性和矛盾性，社會意義必須層次分明一層一層剝，不能像實證主義者那樣粗糙處理。」

「社會科學是平衡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一種藝術，既有理論的普遍性，也有文化的特殊性。自然科學家只需顧及普遍因果規律；人文學者常常強調文化意義的特殊性，但強調太過也有閉門造車的危險。」

「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中國特色』不是寫標語、喊口號，更不能閉門造車，而必須在一種文化特性上建立理論的普遍性。」

Dialogue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New Departure

Discussants: Chin-Chuan LEE, Yu HUANG, Joseph M. CHAN

Editors: Yu HUANG, Joseph M. CHAN

Transcriber: Xin-Yan ZHAO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Chin-Chuan Lee talks about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that begins with his empirical training and ends with a style that combines analysis with synthesis, and straddles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stic perspectives. He explains wh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pursuit of patterns and contextualization is critical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ting exemplary studies, he illustrates how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n best be done and points out its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adequacies. He shares his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Greater China. To him, the commitment to Chinese media studies and openness to global scholarship are essential for innov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a studie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u & Chan, J.M. (Eds.). (2011).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New Departur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1–14.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李金銓教授簡介

李金銓，畢業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碩士，密芝根大學博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兼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在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任教22年，現為名譽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客座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出版中英文編著各七本，英文論文80篇。近著包括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ito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senior coauth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editor, London: Routledge, 2003)，《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主編，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目前正在編的，有一本中國報刊史的中文專著，以及一本國際傳播的英文專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黃：黃煜

李：李金銓

陳：陳韜文

黃：您稱得上是中國傳媒研究的領軍人物。1980年發表《媒介帝國主義再思考》(*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第一次提出與眾不同的國際傳播研究視角。1990年出版《中國的聲音》(*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具有標誌性意義，至今讀來仍然發人深省。能否從您早年接受的學術訓練開始，談談你是如何形成自己學術脈絡的。

李：想不到我居然在國際傳播的領域蹉跎30年了。承你的好意訪問我，不是因為我有甚麼成就，而是我這一代承先啟後，代表華人傳播學術圈進入國際傳播學術圈的開端，我的為學歷程也許對於後來者有些參考作用。這一點我有自知之明，把話講在前頭。我就像白頭宮女話當年舊事，談談國際傳播研究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了。

1971年我到美國念書，首先接觸到三本書，都是入門的經典。第一本書施拉姆(又譯宣韋伯，Wilbur Schramm)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是綜合性的介紹，文字淺白而優美，很吸引初學者。第二本書，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The Passing of a Traditional Society*)，是傳播與現代化理論的奠基之作，略為艱深，當時讀得似懂非懂。第三本書就是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的《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羅傑斯一輩子在修改這本書，逝世以前趕上出第五版。我那時讀的是第二版，書名叫做《創新傳播：跨文化的方法》(*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他根據1,500篇經驗研究，歸納出103個命題(propositions)，並儼然弄了個「得分表」，統計有百分之幾的研究支持這個命題，又有百分之幾不支持它。當時我心想這種研究方法很「科學」，後來從學於他兩年。直到70年代中後期，我逐漸質疑這個路子不太對勁。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黃：70年代後期，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越來越多。你發現的問題是不是與此有關？

李：對。幾十年後，如今回頭批評他們的理論，有點事後孔明的味道，未免不夠厚道，但他們的方法論還是有現實意義，值得拿出來作為前車之鑒。這些前輩學者所代表的，是把美國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投射到全世界，進行再生產。例如羅傑斯那本書第二版的副題標榜為「跨文化」，因為他所根據的經驗研究(1,500)篇有百分之三十是在國外做的。這樣貌似「跨文化」，理論的基本假設卻徹頭徹尾是美國式的。他只是把問卷拿到不同的地區(如印度、哥倫比亞、尼日利亞)去複製，而完全沒有思考這些概念和經驗指標是否有跨文化的意義和社會制度的可比性。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相同的概念可能有不同的意義，相同的概念可能有不同的經驗指標，而概念與經驗指標的關係也會受到文化語境的「干預」。把美國的世界觀強加到其他文化環境，未免抹煞了跨文化的意義。

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把現代化理論講得洋洋灑灑，批評的人已多，我不再重複。然而在方法論上，我總覺得他先入為主，有了結論，再找證據。他為中東每個國家寫一個案例，這些故事單獨看好像頭頭是道，合看卻發現各章取材的角度不一致，甚至有點隨意削足適履，因為要串起來「證明」理論。他寫作技巧高明，故事引人，不仔細分析未必看得出他方法上的「犯規」。勒納認為，「移情作用」(empathy)可以改變第三世界人民的宿命論，是現代化的觸媒劑，而媒介是移情作用的「魔術擴散者」(magic multiplier)。他問土耳其的農民：如果你是鄉長的話，你會做甚麼？如果你是省長的話，你會做甚麼？如果做土耳其總統的話，會做甚麼？這可把土耳其的鄉巴佬嚇壞了，不明白為甚麼會問這種犯大不韙的問題。勒納認為這傢伙就是缺乏移情作用(思想落伍)的象徵。我不禁想起埃及薩達特遇刺後，他的遺孀到明尼蘇達大學演講，有人問她會不會競選總統，她說：「朋友，我想安全回國。」連薩達特夫人都心驚膽跳，何況一介土耳其農民？(薩達特的繼任者穆巴拉克據位42年，最近在「茉莉花革命」中才不得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被迫黯然下台。)天下只有天真的美國人，從小給老師灌輸，相信長大以後人人有機會當總統。勒納把這套東西拿到中東再生產，當成現代化的準繩，不啻是美國中產階級世界觀的國際投射。

黃：80年代初你以《媒介帝國主義再思考》，奠定學術地位。90年開始，你開始自成一體，研究華人社會的媒介問題，能否談談你是如何走出自己的這條路子的？

李：我早年在台灣求學，培養了人文關懷。在密芝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接受嚴格的量化實證研究訓練，所選的課有六成集中在政治社會學上面。原先想分析密芝根著名的選舉研究資料寫論文，我的導師說台灣人做美國選舉沒有特色。於是我就不理其他同學做甚麼，只管開拓自己關心的問題，終於寫出了《媒介帝國主義再思考》的論文，我的導師自言對此一竅不通，卻極力縱容我、扶持我。論文後來順利出書，開啓了我的學術生涯。他的恩惠我至今還不能忘懷。

1982年我到明尼蘇達大學教書，開始兩三年很苦惱，不斷在摸索自己應該走甚麼路子。當時學術界開始激烈辯論傳播研究何去何從，1983年《傳播學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特刊發表歐美學者的爭鳴，對我的衝擊很大。我不斷閱讀各種知識論和方法論的書籍，等到有比較全盤的瞭解以後，才企圖慢慢建立自己的風格。

我喜歡以小見大，猶如牛頓從一個蘋果看到地心引力。我研究的問題多屬這類。這樣一方面照顧到因果規律，另一方面也沒有把豐富的意義簡單化。我覺得研究最好能夠抽絲剝繭，執簡馭繁，用簡單的語言表述豐富的意義，有如剝筍見心。但人類社會畢竟充滿複雜性和矛盾性，社會意義必須層次分明一層一層剝，不能像實證主義者那樣粗糙處理。我在《超越西方霸權》(2004)有一段粗淺的方法觀，不妨錄下來供參考：

以歷史為經，以世界為緯。做中國研究，要放眼全世界；主體性還是中國，眼光包含全世界。……見樹又見林。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全部，才能夠曲盡其致。規律和意義在某個地方是可以結合的。見其大，又能見其小。主題要言不煩，提綱挈領，層次分明，因果嚴謹；但每個主題轉折多致，柳暗花明，意義豐富。(頁317)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黃：國際傳播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哪幾個層次？能否請你為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李：Bourdieu 批評美國人，說他們老以為美國的制度和價值放諸四海而皆準，那是「普世性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the universal)。我把這句話修改一下，另一個極端則是「特殊性的狹隘主義」(parochialism of the specific)，太強調大我小我的特殊性，唯我獨尊，彷彿與全世界不同。這兩個極端都有問題。社會科學是平衡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一種藝術，既有理論的普遍性，也有文化的特殊性。自然科學家只需顧及普遍因果規律；人文學者常常強調文化意義的特殊性，但強調太過也有閉門造車的危險，我的朋友張隆溪教授就反覆強調各國文學有共同普遍的地方。

每個領域的發展軌跡不同，傳播研究向來由美英主導，以致壓倒其他文化的特殊性。除了美英，我們所知不多。因此我提倡做些深入的個案研究。美國的區域研究以個案為主，對政策的擬訂很有價值，例如塔利班恐怖突擊事件發生以後，政府就得借助阿富汗問題專家的分析。可惜區域研究不太有理論關懷，長期位處學術邊緣。我們的個案研究卻必須接通理論、講究方法，這是一種「從小見大」的方法。習慣統計分析的朋友往往批評個案研究沒有概括性。個案研究的確缺乏統計的概括性，但它提供的是「理論概念的概括性」(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好的個案研究幫助我們瞭解世界，視野得以豁然開朗。有理論關照的個案研究，不是傳統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而是以區域經驗為基礎的理論研究(area-based studies)。

黃：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李：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以濃筆敘述的方法刻畫印尼爪哇「農業內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過程，令我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煥然一新。比起巴里島，爪哇島的農田肥沃，不斷吸收剩餘人口，直到田地越耕越少越細，最後良田變廢墟，這就是「內眷化」的過程。學術發展也是這樣，剛開始總是有個大氣象，後來各自鑽進一個小題目，死抱着它越做越窄越細，變成同行也如隔山，沒有共同的語言，連內部溝通都有障礙。這是學術的「內眷化」，也是過分專業化、技術化的弊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塔克曼(Gaye Tuchman)根據個案研究，提出「新聞網」(news net)的概念，分析新聞機構如何運用資源，佈置記者，以適應時間和空間的需求。因為新聞的基礎在於事實(fact)，新聞機構必須撒出一面「新聞網」，捕捉最多的事實。在時間上，新聞機構的作息和社會上的中心機構(包括政府和大企業)同聲共氣；在空間上，派駐記者於重要的地區，重要的機構，和採訪重要的題材。兩方面合起來，塔克曼批評新聞專業主義以建制的觀點為出發點，到頭來維護既有秩序的意識形態。這個「新聞網」的概念的確有照明作用，讓我們豁然了解原來新聞機構是這樣運作的。

薩伊德(Edward Said)更是高手了。他從英法美帝國的文學作品和媒介報道如何建構、扭曲中東，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說法，開創了「後殖民主義」的新河。薩伊德「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把西方霸權的主流文學讀出分庭抗禮、甚至針鋒相對的意義，顛覆了霸權的意義系統。他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個領域了。別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巴西社會學家卡多索(後來當了總統)提出「依賴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也引導了一連串生動有趣的個案研究。這些鮮活的例子都值得我們學習。

黃：個案研究是國際傳播研究的第一個層次，能否談談其他兩個層次？

李：第二個層次是比較個案研究(comparative case study)。最有名的就是韋伯式的(Weberian)「理想型」(ideal type)設計。現在許多研究設計比理想型還要精確，但整個方法論的洞見還是出自韋伯。韋伯的研究以西歐社會的歷史為主，闡述新教倫理促進資本主義的形成，旁及中國儒教不適合資本主義的興起。韋伯不懂中文，只能靠當時有限的翻譯。現在很多人說他對儒家的論斷是錯的，即使如此，韋伯的方法論的洞見實在了不起。

國際傳播的比較研究為何如此之少？過去20年，許多美英出版商曾邀請我寫一本東亞媒介的專著，我為了藏拙不敢貿然答應。中國還可以應付，韓國部分與學生合作也許勉強過關，日本我一竅不通。介紹日本學術業績的英文著作極少，我不懂日語，寫一本膚淺敘述的書非我所願；要深入寫，我又沒有相應的語言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背景和文化了解。難就難在這裏。我們成長時心向美國，對亞洲的周邊國家根本不瞭解。美國學者哈林 (D. Hallin) 和意大利學者曼西尼 (P. Mancini) 合寫的《比較媒介制度》有新意，但整個國際傳播真正讓人信服的比較個案研究實在不多。如果由中日韓學者合寫，大家未必有相同的理論視野，還要花很多時間協調，也很麻煩。但不靠這樣的合作，只能永遠留下空檔。卡茨 (Elihu Katz) 在以色列研究多元移民文化社區如何解讀美國肥皂電視劇，很有創意，好在他用不着顧慮跨國、跨語言，否則困難必大。

第三個層次是大規模跨國、跨文化實證量化研究，這牽涉到問卷調查，找許多的指標去證偽一些假設。在國際傳播領域，到目前這方面工作做得傑出的還不多，解釋往往流於表面，以「科學」為名，形式壓倒實質。前面提到羅傑斯的一些方法論的問題也沒有克服。

黃：我們都在西方學府受訓，你覺得華人學術圈應該作甚麼努力？

李：美國的學術霸權是全面性、籠罩性的，然而美國人多數對國際問題根本不感興趣。我聽說出版商要求英國著名期刊《媒介，文化與社會》多刊登美國學者的文章，這樣才能賣得好，引用指數 (citation index) 才會高。商業邏輯干預學術生產是很嚴重的。第三世界的學者回國之後，沒有跳出美國的影響，也沒有找出適合自己的一條路。我們應該好好思考文化遺產如何繼承與發揚，並進一步和當代西方學術接軌。五四時期及以後的幾輩學者國學基礎深厚，又得到美國一流的研究訓練，中西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們這一代人，不論中西學問的功底，都無法企及最亮麗的前輩學者。何況整個學術社群的急功近利，到達了史無前例的地步：照理說，香港因緣輻湊，有良好訓練的學者應該聚在一起，認真凝聚共識，尋找一條互相競爭、合作、爭鳴的道路，但就是完全沒有這個氣候，因為大家只顧生存壓力，需要趕快弄出一些文章去發表。這個「第三世界身份焦慮症」真是我們的悲哀。正因為沒有自信，更覺得需要向西方靠攏，尤其需要向美國學習，簡直就是亦步亦趨。不可思議，平白浪費這麼好的天時和地利，實在太可惜了。這種文化自信心必須等到何時才能建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黃：可不可以談談你對中港台這幾年社會轉型和媒介研究的一些觀察？是否這幾個地方逐漸開始建立自己的學術社區，並有日趨成熟的趨勢？

李：希望我的朋友們原諒我「實話亂說」：台灣的學者很用功，很工整，很專業化，文獻回顧巨細無遺，但好像新意不夠。台灣的本土化走偏了。本土化不能像駝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堆苦幹，而必須暢懷在國際脈絡找適當的定位。1970到1980年代葛伯納(George Gerbner)編的《傳播學季刊》，沒有這麼專業化，文章良莠不齊，但常常擦出思想的火花。現在該刊的文章篇篇工工整整，統計非常精細，卻沒有甚麼真正的洞見，我抱怨是very careful study of nothing。我們的學術還沒有成型，不要畫地自限，認定傳播應該是這樣的，不是那樣的。沒有成型或定型的東西應該有火花，應該有活躍的思想。台灣個別有識之士也有這個自覺，但救援行動沒有全面開始。

陳：我們希望《傳播與社會學刊》能有早期《傳播學季刊》的味道，但有時也受制於稿件。除了工整和符合規範外，我們更願意見到具創意和啟發性的文章。

黃：大陸呢？

李：不用我來班門弄斧了，留待你來評。老實說，大陸的東西我看的不多，主要還是看史料。

黃：香港呢？

李：首先要向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技術官僚專政」(tyranny of technocracy)發難。我們人人都是學術機器的螺絲釘，每一隻學術工蟻都在瞎忙一番。學術官僚化如火如荼，辦學如搞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把學術思考的空間扼殺殆盡了。學術本該是很優遊自在又有內在紀律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現在奇怪的想法都死掉了。專業化本來是按部就班，做事規則明確；但香港走過頭，設立種種條例枷鎖綁住你，光填表格就搞得你精疲力竭，規章制度直情異化成了韋伯說的「鐵籠」。港商治港，學術政策由一批無知商人瞎指揮，碰到問題就只會向英國和澳洲討一本衰經；而一眾學術官僚只知爭排名，上下交相爭利，都是一副「後殖民」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的心態，那管你甚麼主體性客體性。聽大家高唱動人的「新亞精神」，倘若錢穆再生，學術官僚恐怕要摔破他的飯碗。

黃：從你1990年出版的《中國的聲音》開始，至今已經20年了。20年前，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把20來年關於中國的傳媒研究論文及專著都看完了。現在一個禮拜出的數量就超越了當年，回顧這20年來的中國傳媒研究，有甚麼感想？

李：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冥冥之中莫非有脈絡可循？我有些人文情懷，學術品味是比較old-fashioned的，而且總是順着心獨來獨往。我剛到美國念書的時候，傳播領域只顧美國自己，根本不理會外國，更別說中國不中國，而中國傳媒研究主要是由美國的政治學家擔綱、命題。我有機緣組織一系列的會議，就找一些研究中國最好的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談中國媒介的問題，從週邊包抄，也算是另闢蹊徑。機緣促成我前後編了四本有關中國傳媒研究的專書，在美國建立了一些基本文獻。當然，我是從傳播學科的旨趣着眼的，而不是為「中國研究」服務的。

陳：你在早期的《媒介帝國主義再思考》，找案例來測試理論。從這種方法到幾年前希望在新聞史多做研究，你感覺這和你原來的訓練一脈相承，還是中間有一個跳躍？

李：以我的人文情懷，關注歷史應該是很自然的。我始終覺得社會科學和歷史不應該割斷關係。我不是做歷史的，但知道歷史太重要了。我平常也看史料，但沒有下過全面的工夫，偶爾「業餘」寫新聞史的文章總是如履薄冰，生怕說錯話貽笑大方。我既然在香港做事，有許多便利，不妨搭起一個平台，邀請最好的歷史學家來談中國新聞史，加把勁推動這方面的研究。新聞學者寫的新聞史多半像流水帳，缺乏分析，缺乏理論的視野，所以我乾脆借史學界的養分來灌溉新聞史的園地。《文人論政》在內地頗受好評，我正準備出版續篇。我好像一輩子在當學術的「接生婆」，並且樂此不疲。進入新聞史，是我這次來到香港以後的驚喜。當然，我反對用史料去迎合理論，而是用理論來幫助勾勒史料，這個不能本末倒置。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黃：你一直強調學術要平等對話。去年12月份你舉辦的國際會議「國際傳播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從華人的角度回饋國際社會。這20年來，你先是造一個中國傳媒研究的主體，歸位到國際傳播的領域之中。能否具體談談，你是如何完成這個主體再造的過程的？

李：我們這一代人應該說是開風氣吧。現在年輕人在美國念書，做中國傳媒研究，人家不會再說你做這個東西幹麼。我這個人很遲鈍，不曉得算計利害，也從不管主流或邊緣，總是硬着頭皮追隨興趣走，一路走來沒有人給你掌聲，但成果一一出來，也逼得別人非注視不可。主體再造與問題的合法性有關。我們提的問題和西方學者有一樣的，有不一樣的。以前我們問的問題，西方學者是不重視的；現在我們提的問題，西方的學者至少不能忽視。我們這一代人做了一些努力，爭取部分話語權，外在環境也在變化，比起我30多年前入行的時候，中國傳媒研究的地位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必須嚴肅地說明：不是因為華人學者的身份，才要研究中國媒介；更不是因為華人學者的身份，只會研究中國媒介。中國傳媒研究不能自給自足，無論理論和方法都必須進入國際傳播的風景線，彼此吸收，互相滲透。

陳：你同時用中英文兩種語言寫作，使用語言的不同，會不會對你的寫作經驗有甚麼影響？

李：沒有特別的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寫英文用英文思考，寫中文用中文思考。有時候詳略不一，因為讀者的知識背景不同。

黃：您認為自己對國際傳播領域最大的貢獻是甚麼？

李：我不敢說有甚麼貢獻。但我編的英文書大概有階段性的影響力。國際傳播的邊界不是固定的。卡茨(Elihu Katz)去年12月初應我的邀請來香港，為「國際傳播的國際化」會議做主題演講。他是碩果僅存的大師，卻一再謙辭不懂國際傳播，我一直從旁「力斥其非」，說他做的幾個里程碑式研究對國際傳播太重要了。他在傳播領域領風騷60年，去年12月在香港終於欣然接受國際傳播學者的「新」身份，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回顧我平生能爭得參與國際傳

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播的對話權，想來是很幸運的，但絲毫沒有飄飄然，因為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陳：您研究國際傳播至今30年，對新一代的學者有甚麼期望？

李：我覺得千萬要走出自己的路子。英國的文化研究與美國的媒介研究各具特色，但彼此可以溝通對話。當年芝加哥學派內部視野很不同，但整體看來卻又與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結構功能學派分庭抗禮。華人學術圈應該在密切互動中提出原創性的問題，建立這種獨特的文化風格，既容許內部歧異，又和歐美迥然不同，但足以和它們平等對話。這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境界。「中國特色」不是寫標語、喊口號，更不能閉門造車，而必須在一種文化特性上建立理論的普遍性。我勸學生寫論文要選擇「富有理論意義的具體問題」。唯其是具體問題，才是你切身感興趣的，但必須從具體問題上升到理論的普遍性。換言之，從興趣點出發，不斷培育這棵苗種，使它在某一處跟理論密切接觸，於是點連接成線成面，然後變成立體的架構，看有哪幾個理論可以幫助你思考這個問題，哪些理論需要再造，萬一現有理論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那就自己創造一個理論。這種韋伯式的方法論是值得整個華人學術圈深思而力行的。我們是不是應該有這種自信，應該建立這種共識，應該朝這個目標努力？

李金銓著作選

- Lee, Chin-Chuan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ee, Chin-Chuan (Ed.). (1990). *The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 Chan, Joseph Man and Lee, Chin-Chuan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 Lee, Chin-Chuan (Ed.).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Lee, Chin-Chuan (Ed.). (2000).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6期(2011)

Lee, Chin-Chuan, Chan, Joseph Man, Pau, Zhongdang & So, Clement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ee, Chin-Chuan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

李金銓(編)(2008)。《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
台北：政大出版社。

詳表見 <http://com.cityu.edu.hk/ccr/cc/>

本文引用格式

黃煜、陳韜文(編)(2011)。〈三十年河東與河西：國際傳播研究再出發〉。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6期，頁1-14。